

# 请记住“的哥老王”沦为“乞丐”的命运

## 社会热点

□邓海建

近日，媒体曝光广州出租车司机老王，因举报行业潜规则“茶水费”丢了工作，之后老王为进入广州市交委客管处反映情况，从围墙上跳下来，摔断了右大腿，至今未愈。伤情经鉴定为九级工伤。目前老王正在广州白

云机场北停车场乞讨糊口。

“要脸”还是“要饭”？对于曾经的“的哥老王”，这是一个现实的命题。与之对称的是，有人说在广州，做好事的，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要么是“托举哥”，要么是“的哥老王”。正如不是所有的世界冠军都要一辈子辉煌体面，实名举报的英雄也不是不能有沦为乞丐的一天。

一个正常的社会，从来不需要什么英雄，人人尽己之责，膜拜就不会成为退缩的借口。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王因何而举报”不重要，重要的是“老王举报了什么”。老王举报的真

相，早已尘埃落定。此前媒体报道称，“广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于2012年2月16日抓获某出租车公司营运部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蔡某某”。令人不解的是，扮演“一只耳”的蛀虫落网了，怎么扮演“黑猫警长”的老王也跟着玉石俱焚了？

如果说企业有一千个理由开除不能任劳任怨欺凌的老王，那么，权力者当有一千零一个理由捍卫公民维权的义举。这是一个奇怪的社会生态链：不举报，老王的生活可以一如从前，“茶水费”这个公开的秘密也不会溅起一丝涟漪；一举报，出头的

椽子先烂了，“茶水费”事件也不过是点到即止。真正的问题在于：一者，既然老王的举报事实上增益了公共利益，那么同样以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公权，为何不能在老王与“茶水费”的博弈中助前者一力？二者，在各地类似事件波诡云谲的时候，广州“茶水费”是大是小、是“一个人的偶发”还是“一群人的寻租”？这些问题，必须厘清。

有一点是肯定的，打击举报者就是鼓励犯罪。与其说我们是关注老王的命运，不如说是关注真相在秩序中有无失衡。老王不能从茶水费事件中

全身而退，反而以自己的“命运逆转”替换了“茶水费真相”。那么，当城市需要更多老王站出来的时候，今日的“的哥老王”，算不算成功的对正义的恐吓？试问，政府鼓励举报，民间举报无好报，症结何解？

好在“的哥老王”还坚强地生活着，好在他还能在公共场合为生计而忙活。制度不说话，公权不说话，好在人心还热乎着。那些未必无中生有的传言，那些流转在民间的吁求与价值判断，最后的最后，会让“的哥老王”成为法治进程中的一抹赧色吗？

## 到底是谁的“情况特殊”

### 言者有意

□傅万夫

6月20日上午，网友在微博上爆料称江西南昌县政府副县长钱洁，1971年1月出生，1985年1月参加工作，参加工作时只有14岁。对此，南昌县委组织部称，钱洁的情况比较“特殊”，钱洁1985年参加工作时14岁，15岁时参军。大学学历是参加工作后获取的。

其实，这种事不奇怪，这几年我们看到和听到的实在太多了，有些麻木。不过，一句“情况特殊”让这个本来不特殊的事情变得异常特殊起来。怎么特殊？为啥不解释解释呢？既然敢在政府网上公开领导的信息，又有啥不能将14岁参加工作的原因解释一下呢？

“情况特殊”更像是一种矛盾心理的表现，受制于一些制度的规定以及公众对知情权的追求，政府部门的信息已经不能还像以往那样不用公开了，以为内部通报就万事大吉，这不现实。公开信息，接受公众监督是必须的，但习惯自己说了算，不习惯接受公众监督的惯例，让他们对待这种信息公开，总是充满顾虑。于是，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政府部门用来与民众沟通的网站或者信箱，成了摆设，甚至有的任职公示竟然放在春节假期里，这一切的做法无非都是在规避这种公开可能给他们内定的规则带来的意外影响。这是一种掩盖，尽管看起来很幼稚，但真的很单纯，很直接。所以说，真正特殊的也许并不是这位女县长的工作履历，而是在这种信息公开中，官方所持有的矛盾心态。

说实话，公众之所以习惯在官方的一些信息中鸡蛋挑骨头，并不是因为公众有多挑剔，而是官方在很多事情上，嘴上说的很坦荡，但实际做法很不坦荡。既然官方都知道这位副县长14岁参加工作情况特殊，为什么非要等到公众质疑的时候，仓促回应，而不是在公开简历的时候一并公开呢？是他们没想到如此小的年龄参加工作会让公众质疑？还是那句话，他们对这种公开示众存在芥蒂，自愿公开与被自愿的心态自然是不一样的，尤其还是带着强制性的被自愿公开，很容易把不特殊的情况弄得特别特殊了。

有句话叫“既然无法改变，不如坦然面对”。不光是政府部门的信息公开，很多政务信息，既然逃不了要公开的事实，倒不如坦荡一些，按照公众期待的路子完全公开，这样虽然离自己的期望有些远，但至少能够赢得公众的认可，也算有所收获。

## 丈夫不交银行卡，妻子为“喂奶收费”？

□文/前溪 图/朱慧卿

青岛罗先生称妻子给孩子喂奶向自己讨要喂养费，生儿子时索要了5万元生育金，外加减肥经费和岳母的看护费。罗先生称妻子平时做家务亦要收费，洗衣按照酒店价格收费，衬衣8元，外套15元。

夫妻之间，本不能斤斤计较，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有“内核”，即信任和尊重。而一个妻子经常性地变着法子向丈夫讨要各种费用，看似是为自己的地位抗争，看似在巩固自己的安全感，然而，在一次次的讨要过程中，却是对婚姻的一次次撕裂，当裂缝被一次次的“费”填充扩展，婚姻生活可能就要走到尽头了。婚姻生活中最不能讲索取，其主题词最该是“奉献”。

“喂养费”等古怪费的背后，

是妻子缺乏安全感，这跟没有工作有关，也跟缺乏信任有关。夫妻之间最需要的是信任，妻子如此过度索取，是不信任丈夫，这是婚姻的大忌。尽管这对夫妻听取了别人的意见，采用了新的理财方式，但如果失去“信任”这块基石，恐怕还会矛盾不断。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都有“内核”，即信任和尊重。而一个妻子经常性地变着法子向丈夫讨要各种费用，看似是为自己的地位抗争，看似在巩固自己的安全感，然而，在一次次的讨要过程中，却是对婚姻的一次次撕裂，当裂缝被一次次的“费”填充扩展，婚姻生活可能就要走到尽头了。婚姻生活中最不能讲索取，其主题词最该是“奉献”。



## “公考”只有价值摆正，才能立信于人

□蒋璟璟

6月17日，陕西米脂县举行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笔试，考生发现，该次考试的试题竟然全部出自一本名为《公共基础知识》的备考书籍。该参考书是陕西省直及地市、县事业单位考试专用教材，而且这本书在米脂县基本买不到。因而，此次考试被质疑“有重大泄题和作弊的嫌疑”，对此招考部门称将核实。

公考，一面兜售希望，一面孵化失望。当一本《公共基础知识》，提供了招聘试卷的所有考题，公众有理由猜测，“荒诞”仍在继续、变种以及蔓延。人所共知，作为一种相对公平的取才方式，笔试的魅力在于，能最大限度驱除人情因素，遵从量化评测的逻辑，以分数体现素质。只是，一旦考

题事先泄露，一切又何从谈起？

那本神奇的《公共基础知识》，为之定性尚且太早，妄言其中暗藏勾当，或也缺乏实证。确定的是，比照“命题规则”，照抄照搬的试题，绝对是说不过去的。一切考试的价值，都维系于“有限的不可预知性”——知道大致范围，无从知晓具体题目。但在米脂县此次招考中，部分考生所知道的，已是题目与答案的全部。之后的结果是，一方面笔试全无平等竞争性；另一方面，所谓招聘也丧失了人才甄别功能。

到底是命题人偷懒？亦或是故意做局？必须说明，“公考产业”发育至今，某些培训集团、助考组织，确实给出题者施加了一定的“反制效应”，命题往往跳不出、乃至参照助考资料的圈定……其原因不难理

解：助考机构是专门的考试研究者，某些单位的命题人，不过是偶尔为之的“临时工”，怎可有所突破？此外，出题者与助考者的利益合谋、身份重叠，当然也是重要诱因。

即便这样，将米脂县的滑稽考卷，通通归罪于助考机构气场太大、神通太广，也难过关。关于泄题、作弊的种种流言，既是人们对类似乱象的情绪反射，又是基于具体情况的合理猜想——谁让米脂此番招聘仅设笔试环节呢？可以想见，该事今后的走向，即核实与调查的最终结论，将继续吸引民众持续关注。而超越个案，公考本身的命题思路、或曰考试设置，本就亟待通盘反思。

一切考试，有知识型、能力型之别，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理论上说，“公考”也标榜对知识与能力的双重

考量。但实际上，过于强调记忆力、模式化写作等，已使得公考愈发可以预料、可以准备。久而久之，公考必将矮化成对备考者的筛选，而非对广义人才的选拔。须知，优秀的备考者，是可以被量产、可以被速成的；然而，公职机构真正需要的，本不是考试优异者，而是认可现代政府理念，熟悉公共治理常识、具备极佳专业素养的“人”。

公考只是事业单位招聘的工具，而非事业单位招聘本身。对于“公考”事实性的失败，米脂县的滑稽考卷，提供了一个恶劣的样本。为此追问，固然要对涉事方追责，更须厘清一个根本性问题：事业单位需要怎样的人才，以及如何以公考为工具，精准筛选出目标群体。

## 评论者请讲真话

着乐。除非有特殊原因。

评者面对一部作品，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只要是在说真话，便是完成了一个真实的创作过程。而如果是违心说假话，颠倒黑白，作品的创作立刻被异化、中止。任何文艺作品在讲假话的评论者那里，不仅难言完整，收获的也只能是失败，或者是悲剧。

从历史的长河看，迫于种种压力，佳作也可能被虚假地评为劣品，劣品也会被评论家阿谀奉承假意评为精品。但一旦到了能讲真话的时候，再来重新评论一番，金子终会闪光，废品也终会露出原形。

现代文艺史的一段特殊时期中，评论者很难讲真话。因为“创作者”不需要你讲真话，只要你讲好话，哪怕说假话也无妨。著名戏剧家曹禺被逼得常念“三好经”：编得好、导得好、演得好。但良心让他痛苦，于是三缄其口，看戏前长叹：不好说、说不好、不说好！评者不敢说真话的年代，难以产生真正的优秀作品。

现在文艺政策宽松了，讲真话不再挨棒子，可为什么讲真话的评论者却越来越少了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利益驱动。某作者要拿这个作品去评奖、升官、当教授，便塞给评论家们一个个厚厚的红包，评者

便全拣好听的讲，这叫“红包评论”。有句打油诗道：没有红包，面对佳作不讲真话；有了红包，面对次品乱说假话。

某部门要靠这个作品获得政绩，得到赞赏，请评者造势。这时就是没有红包，也得溢美一番。如果这部作品的出品方是上级领导机构，大家就互相提醒，评论千万要小心，祸从口出，真言逆耳，被穿“小鞋”，断了前程。

其实，很多作者包括领导是要听真话的。要听真话也容易，文坛常言道：当面说的真话少，背后说的真话多，读者的口碑句句真。